

前 言

人性问题，是中国历代思想家们所十分注意探索、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他们激烈论争、歧义较大的一个重大问题，更是对后世影响巨大，又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性问题，可谓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源远流长而终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尽管如此，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们却为人类的认识史积累了真理的颗粒，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珍宝奇异的思想宝库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不同学术派别的思想家，都对人性问题作了艰苦的理论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申明了自己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观点，就其思想总体、思想实质来说，是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从人类认识发展史来看，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前进，认识的深化，而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和日趋精致，方法上逐渐严密。各个学派在对立中互相融合，在斗争中互相影响，在争论中互相去取。各家之间既批评对方之缺点，又吸取对方之长处，既互争雄长，又共同前进。这种在对立与影响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性理论，确实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从先秦时期的人性善恶的辩论、汉唐时期的人性三品说的提出，到宋元时期的人性二元论的创立，明清时期的人性

学说的发展，都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人性思想之丰富性、复杂性、重要性，这不仅为我们今天进一步分析、研究、探讨人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而且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人性问题，是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最为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人生哲学和伦理道德学说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家尤为注重人性和人伦道德规范问题。因此，人性问题，直吸引着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注意力，并促使他们去进行艰苦的研究和探索。这就使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理论，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人性”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中，其涵义是极为不同的，有的指人的自然质性，生而具有，不学而能的本能欲望，即“生之谓性”；有的指人之异于或优于禽兽的仁义道德属性和理性活动，即“性善”与“性恶”之性；有的指人赖以形成生命，体现天命、天理的根本属性和成圣、成佛的根本依据，即“性即理也”和“性各自有，不待因缘”；有的指人的主观精神、思想活动，即“性即心也”等等。因此，人性问题就与人生问题、伦理道德规范问题、人生理想、人之为人等问题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人性问题的注重研究，深邃精思，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本书力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遵循历史时代的发展，沿着思想演变的脉络，对中国思想史上的人性论作初步的探讨、评述，以期引起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但是，由于作者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实属难免，挂一漏万肯定存在，希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第一章

先秦时期人性善恶的争论

人性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最早提出和最为注意的一个问题。远在商、周时代的《诗经》和《书经》中，就已经有了“人”和“性”的记载，但却没有把这两个字连用。这里讲的“人”则是指人生，“性”则是指天性。当时所讲的“天”，是人所由的根源，所趋的宗向，人不离天，所以称为天人。这时人性还没有作为哲学范畴提出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中，人性问题，便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各家各派围绕着人性的善与恶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有关人性之善恶的主要观点在这个时期，基本上都提出来了，并为以后人性理论的发展，首开其端，拉开序幕。

一 孔丘的人性论

孔丘（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 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由于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突出贡献，使他成为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思想在

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理论的思想家。他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①开创了人对自身研究的先河，具有发端的意义。孔子很少讲人“性”，就全部《论语》来看，只有这一处讲人“性”。因此，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②孔子对于人性，没有进行具体的论述与探讨，他所说的“性相近”，是善相近、还是恶相近呢？“习相远”，是善相远，还是恶相远呢？都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这只能说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由于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习惯之不同，而使人的习性差别愈来愈远了。至于旧时的启蒙教科书《三字经》中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糅合孔子和孟子的人性思想而成的，已经不是孔子思想的原意了。

我们应当看到，孔子的人性理论，虽然没有说明人性善恶的问题，也没有对人性作出具体的阐释，但是，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的本性与后天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是孔子后继者们所经常研讨的一个问题。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一生的主要精力是从事于教育事业。他以人为自己思想的一个中心，建立他的伦理道德学说。孔子提出“仁者人也”，在这个命题中，说明人是人，不是神，人要靠衣、食、住、行，维持生命，繁衍后代，说明物质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人是人，不是动物，人生活在社会中，要长幼有序、尊卑有等、贵贱有别，人生活在具有宗法观念、等级制度的君臣、父子、兄

《论语·阳货》，《论语译注》，第181页。下注页码均以该书为准。

② 《论语·公冶长》，第46页。

弟、夫妇、朋友等社会关系之中，在这个社会中的成员都要以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孔子认为“礼”规定了各个不同等级人们的政治地位、权利义务、道德原则，这说明了人的社会本性：“仁者人也”、“仁者爱人”，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仁爱的关系，而不应当是尔虞我诈的关系。因此，孔子主张，人的生存应当正直而有道德，不应当诬罔不直而侥幸苟活。所以他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①

“直”是耿直、坦率、正直、正派；“罔”为虚伪、奸诈、隐曲。孔子认为，“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②人应当有“仁”与“直”的道德情操。

孔子进一步指出，人生来虽然“性相近”，但并非完全平等，而是有等级之差、智愚之别的。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③既然人有这种智慧高低之差、认识能力之异，当然教育的内容、深浅的程度就不同了。即“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④中等以上智力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等以下智力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孔子实行“因材施教”是为了培养“成人”，使人成为一个标准的人。孔子认为，“成人”应该具有智、仁、勇三德，再加上有技艺和礼乐的修养，既多才多艺，又清心寡欲，更临危不惧的有道德之人。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⑤“成人”的标准，不在于才力，而在于道德。人的智

①④ 《论语·雍也》，第 61 页。

② 《论语·阳货》，第 页。

③ 《论语·季氏》，第 177 页。

⑤ 《论语·宪问》，第 156 页。

慧用于为人之道，就成为有道德的人。上智之人，理智高，办事正，没有私心，光明磊落，趋向于善；下愚之人，理智低，处事邪，多求情欲，心术不正，趋向于恶。这种智愚之差，是先天具备的，不可改变的。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①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②在孔子的思想中，“上智”与“下愚”是含有善与恶的意思。“中人以上”的“上智”之人，当然是性善的，“中人以下”的“下愚”之人，无疑是性恶的。天生的善人和天生的恶人都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生性是“相近”的，由于后天环境的习染不同而“相远”了。在孔子的心目中，人是有善与恶之分的，善人是指君子、仁人，恶人是指小人、愚人。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仁”，即人有伦理道德。因此“仁”是他伦理道德学说的核心和施行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可见，这个“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具体内容包括：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品德，“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③“仁”既是人们要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又是人们生活的最高道德原则。要达到“仁”的最高目标，就要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视、听、言、动，要用“忠恕之道”去处事、待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⑤这样做了，就是“爱人”了。孔子的这些思想都和“性相近”的观点，是紧密相关的。由于人之“性相近”，因此人只要“学礼”，“习

① 《论语·阳货》，第 181 页。

② 《论语·里仁》，第 35 页。

③ 《论语·阳货》，第 183 页。

④ 《论语·雍也》，第 65 页。

⑤ 《论语·卫灵公》，第 166 页。

礼”；“用礼”，就可以维护、巩固仁性，达到仁人的境界。据此，孔子反复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①为了捍卫“仁”的最高原则，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在所不辞。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②只要时时不违仁，处处去行仁，就是“仁人”、“圣人”，最终达到“天下归仁”和恢复周礼的目的。孔子把恢复和巩固周礼的统治秩序称为“仁”。周礼是建筑在宗法制度、宗法观念“亲亲”基础上的，所以孔子特别重视孝、悌，强调培养人们的孝、悌之品德，他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③孔子的弟子有若概括他关于仁的思想时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就是说，在家行孝与入朝行忠是统一的，族权与政权是统一的，孝于家族长辈，就是忠于国家朝廷。人人都能行孝、行忠，就不会“犯上作乱”，统治秩序就能维护下去了。有若说孔子的这种思想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④孔子的这些思想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

孔子虽然很少讲“性”，更没有讲性之善与恶。但是，他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命题，却包含着善与恶的萌芽。“性相近”开了孟子的性善论之端；“习相远”开了荀子的性恶论之端。因此，我们说，孔子第一个提出了人性的学说，虽然没有展开具体的解释、论述，但却有其发端的意义，并对后来的人性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语·颜渊》，第123页。

《论语，卫灵公》，第163页。

③ 《论语·学而》，第42页。

二《大学》、《中庸》的人性论

《大学》和《中庸》原来都是《礼记》中的一篇 宋代把它们从《礼记》中抽出，而与《论语》、《孟子》相配合 并列为“四书”。《大学》一篇，朱熹认为是曾参所作，多数人认为是秦汉之际儒者所作，但从其所反映的时代内容看，应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作品。《中庸》则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司马迁说：“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①郑玄在《目录》中说：“《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孔颖达说：“《中庸》是子思伋所作。”^②他们都断定《中庸》为子思所作。因此，我们把《大学》和《中庸》作为早期的儒家著作，并就其关于人性的思想，加以研讨。

《大学》是讲人生之道的教育之书，人生之道以修身为本，进而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人生之道的根本和开始，修身就要正心、诚意，发扬善性，达到至善。所以《大学》在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说，通过教育，使人“明明德”，“明明德”是使人的光明之德能够不断发扬，光明昭著。这里讲的“明德”，就是指人性之善。《大学》虽然没有讲到人性之善，但从其整个内容来看，则可以断定是指人性之善说的，并且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明明德”是进行上达

① 《史记·孔子世家》，第1946页。

② 《礼记·正义序》《十三经注疏》第1226页。

教育的开始和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达到“亲民”，最终实现“止于至善”。这就是说，从人性之善开始教育，到“至善”为止。因此，我们说《大学》中，是讲到人性善的思想。

《中庸》里多次讲到“性”，不仅从伦理道德规范方面讲“性”，而且从哲学理论高度上论“性”，其涵义十分深刻。人性是人所有的天命，天命为上天之所命。《中庸》以人所受命于天所规定的原则为性，按照这种人性去行动，就称为人生之道即“人道”，教导人遵循人生之道去修身行善，就是教育。这种人生之道是“不可须臾离也”。所以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①

人性之德包含着“仁”和“智”，人能按照人性之德而行动，就是体现了人道。体现了人道，就达到了“至诚”的神境。

“至诚”之人，就能充分发挥人的善性，这样的人，既可以尽人性，又可以尽物性，更可以“合内外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而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了。这就是说：“至诚”之人，能使人性充分地表现出来，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神境，就一切都明了。因为人性本来就是明的，人只要诚于己，性由心而明了，这样“自诚明”“之性”与“自明诚”之教，就可以同时体现出来了。所以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②“诚”之己，不仅要“诚己”，而且要“诚

《中庸》第二十一章 第 32 页。

② 《中庸》第一章。《四书集注》，第 17 页。下注页码均以该书为准。

物”，诚则有物，“不诚无物”，而“性之德”就在于“合内外之道”。具备这种最高善性之人则是圣人、君子。他们既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①又能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②这种人真是全智全能的神人。

《大学》、《中庸》作为政治哲学论文和人身修养之书来说，都把人性的修养与政治的好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论是《大学》的“明明德”，还是《中庸》的“自诚明”，都是以“明”代表人心的虚明不昧，正直的善心，发而成为善性。人人都做到修明心、发善性，就达到“居上不骄，为下不信”的政治目的。就是说，人人各安其位，各守其责，不犯上作乱，不背叛反抗，死守善道，保持中庸，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就是“立天下之大本”了。这样充分地发挥了人的善性，就体现了天理。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中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书，通之体也。”朱熹是最能理解和注释《中庸》思想的，这段注释是符合《中庸》原意的。

由于《大学》、《中庸》把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人性修养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所以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嘉许和儒家学者的推崇，奉为政治经典和修养经典，其影响是极其广泛深入的。后来的儒家学者，都是颠来倒去的讨论其思想要旨。

《中庸》第三十二章，第 38 页。

② 《中庸》第二十七章，第 35 页。

三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

世硕（生卒年月不详），战国初期人。他的著作《世子》早已佚失。据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说，世硕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人性有善有恶论的人。我们只能根据王充引述的世硕的有关人性的资料，来分析、研究世硕的人性理论。王充说：

“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①

世硕所作的《善书》篇，今已不可得而见。仅就王充辑录的世硕关于人性的观点看，世硕与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人人都认为人性是有善有恶的。世硕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善”与“恶”这两种不同的自然质性。这种差别是先天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如同气有阴阳之分一样，阳气表现为善，阴气表现为恶。因此，世硕所说的“人性有善有恶”，是从抽象的自然属性上来理解人性的。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世硕虽然认为人就有善与恶的不同本性，而要保持和发扬这种先天的本性，则在于“养”。

① 《论衡·本性篇》，第43页。

即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培养。后天养之善性，就使善性不断增长；养之恶性，就使恶性不断增长。养善性在于增加阳气，养恶性在于增加阴气，这就是说“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世硕在肯定人性的先天自然属性的同时，又承认后天教育培养对人性善恶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他一方面把人看成是自然的生物的人，另一方面又看到社会环境对人性善恶的增长、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就这后一方面说，确实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世硕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早提出人性有善与恶之分的思想家，对中国古代的人性理论作出了贡献，并对后世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人性有善有恶”论，得到了一些思想家的推崇、赞同，被一些思想家所吸取、发挥。王充就是其中的一个。王充在记述、分析各个思想家的人性理论之后评论说：“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性情，竟无定是。唯世硕、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①王充是肯定、吸取世硕的人性理论的。

四告不害的性无善恶论

告不害（约公元前 420 年—公元前 350 年），战国中期人。由于他的著作早已佚失，因此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无法详述。仅据《孟子·告子上》所引用的思想资料看，告子在与孟子辩论人性之善恶时，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点。

^①《论衡·本性篇》，第 46 页。

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孟子提出性善论，告子则提出性无善恶论，他们彼此互相诘难。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告子是最先提出性无善恶人性理论的。

什么是人性？告子作了界定：“生之谓性”，“食色，性也。”^① 天生来的本能为性，后天学习养成的习性为非性，因为食色是人人生来都具有的本能，所以为“性”。为善必须教导积累，为恶亦须诱发养成，所以不为“性”。据此，告子提出了性无善恶的人性理论。

告子认为，性是无善恶的，人们生来之性既不是善，亦不是恶，善与恶是后天经过社会环境的教育而形成的。所以他说：“性无善无不善也。”^② 善与恶都不是性，而是后天教育培养使性的改变，由于这种改变，或表现为善，或表现为恶。性如同白纸、白羽、白雪，随外界环境之习染而变化颜色。告子以比喻说明他的人性理论，他说：

“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③

告子举这些事例，旨在论证没有先天的善恶之性和道德属性，而是后天环境养成的，这就象杯棬那样要靠人力加工而成型，象湍水那样要靠人力引导而流动。告子强调后天的教育作用，

① 《孟子·告子上》，《孟子译注》，第254—255页。下注页码均以该书为准。

②③ 《孟子·告子上》，第258、253—254页。

这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告子虽然把人天生的资质称为性，但是他并没有把“性”和“仁义”混同起来，“性”如同“杞柳”指的是人的自然属性；“仁义”如同“杯棬”是指后天教育而培养的道德品行。因为“杞柳”与“杯棬”不是等同，所以说“性”与“仁义”亦不能混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告子似乎看到或猜到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不同，但他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尤其应当看到，由于告子过分地强调了人的自然属性，降低了人的社会地位，把“生之”“食色”本能视为“性”，这就从根本上泯灭了社会的人与自然的动物质的区别性。因此，孟子反驳告子说：“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①从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中，可以看出，告子不仅混淆了人与禽兽之间的质的差别性，而且抹杀了不同物质的规定性。告子认为，天生的性如一切东西的白色都叫做白是完全一样的，不管是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都是完全相同的白，即凡是白都是一样的白，这就否定了千差万别的不同质的事物的不同白的差别性。进一步推论就必然得出“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都是完全相同的性，即凡是性都是相同的性，这同样否定了人与禽兽的质的区别性。告子犯了无类逻辑的错误。事实上，象告子所说的人和禽兽都共同具有的无善恶的共同之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五 孟 轲 的 性 善 论

孟轲（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是战国时期著名的主观

^① 《孟子·告子上》，第255页。

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善论，并把性善论作为伦理道德学说和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①孟子所注重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人性，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性，人性既是人的伦理道德生活的根据，又是人施行政治主张的基础，因为人有善性，所以才能讲道德，行仁政。孟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性善论方面较系统论述人的哲学家，性善论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人性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最早注意讨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哲学家具有“贤人作风”的特点，所以人性问题最引起他们注意。

孟子这样重视人和人性问题，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时代原因的。战国中期以后，人和人性问题，逐渐被提到哲学家争论的日程上来了。在争论中，提出了几种不同的人性观点，从《孟子》书中记载孟子的学生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善恶问题，有如下四种主张：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②

① 《孟子·滕文公上》，第112页。

② 《孟子·告子上》，第258—259页。

孟子集中攻击了告子关于性无善恶的人性论，而提出性善论。孟子针对告子的“杞柳”与“杯棬”，“湍水”与“流行”之喻，说明人性没有先天的善与恶的观点，进行反驳。他认为，“杞柳”是可以编织成为“杯棬”的，人性是可以包含“仁义”的，人不要“戕贼杞柳以为杯棬”，也不要“戕贼人以为仁义”，而要“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棬”，“率天下之人”以为仁义，因为人有“仁义”的本性。孟子在辩论中，偷换了命题，告子是打比喻，说：“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而孟子则把“犹”改为“是”。问题在于杞柳可以编为杯棬，但并不就是杯棬；人性可以成为仁义，但并不就是仁义。孟子还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①他并没有回答告子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告子说的“湍水”决诸东方则东流 决诸西方则西流”也是讲“水无有不下”的性质，如果水不就下，就不会决之东方而东流，决之西方而西流了。

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的主要表现是人性和禽兽之性不同，人的生活高于禽兽的生活，因为人有自觉的道德观念。孟子在反驳告子的“生之谓性”时，就指出“犬之性”、“牛之性”与“人之性”是各不相同的。孟子指出，人的本性、本心和禽兽本来是不同的，但由于有的人不知道保存自己的本心、本性，而把本心放了，善性丢了，结果变得和禽兽差不多了。因此，孟子十分强调“立心”，“养心”，“求放心”，“养性”，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善人、大人。

① 《孟子·告子上》，第253—254页。

那么心、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孟子说是天所赋予的，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①

人要不断地膨胀自己的心，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人的本心、本性都是上天赋予的，人能够认识这些东西是上天给予的，就是事奉上天了。

孟子认为，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特征。孟子为了证明他的性善论，便由心的天赋观念去证明，因为人心天赋是善的，所以人性也是善的。这种先天赋予的善心是人人都具有的。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隐之心，

^① 《孟子·尽心上》，第301页。

● 《孟子·公孙丑上》，第79—80页。